第一章　安多藏区的时空范围界定

第一节　理论支持

一、国外空间研究理论

空间与时间是两个最为普遍的社会要素之一，也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空间”研究只是哲学的研究范畴。最早将空间研究引入人类学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莫斯(Marcle Mauss)。他们从经验和认知两个方面论述了空间的独立性。他们认为空间既是独立于社会组织外，又“无不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相对应”。同时他们又认为空间是一个自我意识的组织社会，人们自然而然的在它所处的空间中扩展自身，并对空间进行划分、区别和安排。布朗（A.E.Radcliffe－Brown）继续了这一观点，但他认为地域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它通过聚集和分化承载了政治、经济等组织，他的这个被称为“化约主义”的观点，夸大了“经验”而忽略了“认知”。埃文斯·普理查德（E.E.Evans Prit-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ard）深化了涂尔干的社会空间概念。在《努尔人》[①]一书中，他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的、生态的、结构的三个层面并进一步解释到：物理的即实在的，也就是朴素的经验的空间；生态的指“以人口密度和分布状况来界定”，同时以自然资源为参照，即土著观念中的空间观念；结构的则指人群体之间的距离，它是以价值观来表达的，也就是研究者构建的空间。在他之后，利奇（Edmund Leach）和列维·斯特劳斯（Caude Levistrauss）将空间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在房屋研究中，得出了空间形成的象征机制观点。他认为房屋是介于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中一个独有宇宙观的社会，此时房屋即为空间，空间形成于象征。另外他们还提出了空间在经验和认知上存在着涵盖关系，即认知涵盖经验。他们认为“空间配置并不反映真实的、无意识地存在于土著人头脑中的一个模型”[②]。他们的后一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反对，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的活动使空间被认知、被生产、再生产。非洲学进一步指出，政治是造就空间的主要原因，实践也是空间的再生产机制，布厄迪（Bourdieu）将实践“深化”为“惯习”。在对中国的‘田野’研究中，空间研究的理论被进一步丰富了。施坚维（William skinner）在对中国晚清社会的研究中得出了市场是空间形成的主要机制的观点，从宗族之间的地域关系到通婚再到械斗等，均反映了空间形成的市场机制。而且他认为中国的宗族等各种空间组织无不与“风水”这一宇宙观念相关联，风水大到可以安排国家，小则可以组建一栋建筑，一个组织的兴旺发达与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从非洲学起，人类学将空间研究延伸到了地域，

① 埃文斯·普理查德著，诸建芳等译：《努尔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埃里蓬著，袁文强译：《今昔丛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将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变为人类学的可操作的研究领域，空间的研究也从认知与经验研究扩展到了其形成机制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了空间研究在地域研究，在地域性社会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二、国内的空间研究

国内的空间研究偏重于历史研究，主要源自于台湾学者。20世纪70—80年代，许嘉明、施正民、林美容、郑依忆等一批台湾学者开展了“祭祀圈”研究，一度成为台湾人类学区域文化研究的主流。加入该研究的还有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等，他们将该项研究扩展为两岸的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学者也从历史与重构的角度研究空间。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在《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① 一文中，通过对土族时空观的研究，探讨了现代社会对土族时空观重构的影响。吉首大学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在土家族文化研究中，对该族时空域观念作了研究。另外，近年来的一些学位论文也有一部分涉及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希望通过空间研究扩大研究视野，反思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

三、空间研究的意义

空间研究的意义在于诠释“我们所看到的原有地域基础的社会单位，其范围的认定及社会单位本身的概念已与实际地域的范围不相符合(以下简称‘不相符’),而是建立在其概念的和象征的建构上。……土地已不再有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地理形式

① 高丙中：《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载《象征与社会》，第216～25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或建构环境已不重要。事实上，文化反而是透过空间来建构这‘社会’共有的象征与概念’①。这里不仅论述了空间研究的意义，同时还指出了这种“不相符”的特殊文化现象。安多藏区这个文化区域空间概念正如黄应贵所言存在着这种“不相符”。因此，我们研究透过空间来建构社会共有象征与概念的安多区域“文化”，就必须先研究其空间概念的机制、构建、范围及变迁，就必须对其空间范围进行界定。因此，我认为对安多区域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区域”的研究，而安多藏区的时、空、范围概念中所存在着的‘象征空间’‘本土认同空间’和‘研究者构建的空间”等不同层面的涵义及变迁是安多区域文化研究的基础。

第二节　　安多藏区的时空界定

在安多藏区这个地域概念中，“不相符”的文化现象十分突出，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文化现象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空间范围。与中国其他区域的空间概念一样，安多藏区也分别存在着剧烈变动的行政区划、本土认同的和研究者构建的在外延上重合或不重合的不同意义、不同层面的空间范围。显性的行政区划变动剧烈，名称更换频繁，其为政府治国策略的探索，由于政府及其治国方略的频繁变更，也就导致了行政区划的屡次被更改，变化频繁和其中过多的人为因素，使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未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在当地居民的本土观念中，有他们自己认同的地域名称和空间概念。本土观念虽然也同样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相对的稳定性是其被认同和学者们构建研究空间概念的前提条件之一。

①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第 26 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

一、本土认同的安多藏区

安多藏区，见之于史料的名称主要有“安多”、“阿木多”、“安木多”、“多麦”、“朵麦”、“阿朵”、“阿多”、“脱思麻”、“朵思麻”、“番”等，自明清以来称安多。上述名称均为藏语音译，其中“阿朵”、“阿多”、“安木多”、“阿木多”等是传统的本土认同空间概念。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的范围不同于行政区划，其边界并不十分明确，通常指今青海巴颜喀喇山以东，包括青海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甘肃藏区及四川阿坝在内的使用安多方言的地区。“大约到元朝，藏人对自己所聚居的地区已有了明确的地理概念”①，即“自阿里的贡塘至所拉夹窝山以上之区域称为卫藏法区；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多朵人区，自汉地白塔寺② 以上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③ 卫藏，自古就是青藏高原藏传佛教的起源和传播圣地，因此，被称为“法区”；康区人，具体说来是康区的男子，则以英勇善战、善于经商、能文能武、英俊潇洒而闻名全藏，故称“人区”；而安多地区则是高原畜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马代表着牧业文化，所以被称作“马区”。安多区域文化的载体——藏族，自我认同为“安多哇”，所操语言为藏语安多方言。

田野调查与藏文史籍显示，藏族传统上就有用山川河流作为区域空间划分的习惯。见之于史书的地理区划单位主要有“部”、“围”、“岗”、“翼”等，一般三部为一围，两水之间为一岗。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由拉卜楞寺著名高僧智观巴·贡却

①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180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②原注：甘肃永靖县，即今刘家峡水库库址。

③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5 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乎丹巴绕吉撰写的《安多政教史》，就记载了当时人们对整个藏区空间的划分，依据本土空间划分的传统概念，整个藏区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翼，下部多康六岗①,后又演变为“多康三岗”。三岗范围包括“马尔康”(巴尔康,意为中康)、“野摩塘”(多麦)、“吉塘”(宗喀)。也就是今天康区与安多藏区的范围。

此外，安多民间还有“自圣域金刚坐向北，据说经百由旬，有具祥萨迦大寺，由此再向北百余由旬，即达多麦地界”②。“自通天河至色吾河谷，北通巴颜喀拉山，东麓有阿庆冈嘉雪山、多拉山，取二山之字首，称安多”。③ 安多亦作阿垛，系“阿钦岗日伊甲日”④ 和“垛拉仁摩”⑤ 之合音⑥ 等不同的传统认同的安多空间范围。

综上所述，在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中，其范围为共同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某山脉或河流之间的生态空间即为安多。这种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本土居民的认同，也是研究者构建安多空间概念的基础和依据，因而形成了研究者所构建的安多空间范围与本土观念认同的

①“六岗”指撒茂岗（即金沙江和雅砻江上游中间一带地区的今白玉、德格、石渠县等）、察哇岗（即怒江和澜沧江中间地带的今八宿、左贡等县）、马尔康岗（即金沙江和澜沧江上游中间地带的今昌都、察雅、芒康等县）、包柏尔岗（即金沙江与雅砻江下游中间地带的今甘孜南部、云南西部地带）、玛尔扎岗（即今果洛州黄河以南的部分及甘孜州原泰宁以北地区）、木雅岗（即雅砻江中游东部的今甘孜州到康定泰宁一带）。

②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3 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③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4 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④“阿钦岗日伊甲日”指今昆仑山脉中的阿尼玛卿山，其横亘甘、青、川三边。

⑤“垛拉仁摩”即今祁连山，也有人认为是积石山。

⑥ 罗桑崔臣嘉措著,郭和卿译:《塔尔寺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空间范围之间的部分重合。

二、研究者构建的结构空间范围

以本土观念为基础，又不完全等同于本土观念的，根据“人群之间的距离，以价值观来表达”的是研究者所构建的安多藏区空间范围，这一意义下的安多藏区概念也有许多，其中以“东藏方言区”和 20 世纪以来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李安宅先生的观点最为典型。

翻阅藏文史料，对于藏区的地域空间的划分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就是研究者将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划分为东藏方言区，又称安多藏区。这一划分虽与本土认同观念中的安多空间范围有重合，但研究者划分其的依据不可能只是本土观念，也当是以该区域的文化符号——语言为标准而进行的。

著名学者李安宅先生在他的《安多社会调查系列报告》中认为，自己的这篇调查“若按照应有的性质完成的话，应该叫做川、甘、青边界地区边民分布概况，因为这一名称才算准确地表明这样一个自然区域——即藏语中称为‘安多’（或作‘阿木多’）的藏民区’[①]。他将安多藏区的地域范围界定为“藏族区，不考虑行政区划，包括东经 78°～104°、北纬 27°～38°的区域。如要与外面所用藏学术语相联系，该区域可分为三个文化区：含：1. 西藏，2. 西康，3. 安多，包括：（1）中国青海省的藏族区；（2）甘肃省西南部的藏族区；（3）四川省西北部的藏族区”[②]。这一划分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本研究在不作专门声明的情况下，也采用这一空间界定。

①李安宅：《安多社会调查系列报告》，《新西北》 4 卷、5 卷。

② 李安宅：《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1948 年），载《李安宅藏学文论选》，第 263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三、行政区划的安多空间范围及其变动

安多藏区在元以前未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中，汉时这里还是羌、匈奴、鲜卑吐谷浑、党项等民族活动的舞台，中央政权曾在此地设置河西四郡，其地域范围大抵与羌人的活动范围相同，后吐谷浑建立政权，其疆域囊括了安多的一部分。 8 世纪，吐蕃进入安多藏区，经“吐蕃化”时代，至 12 世纪，藏民族（吐蕃——藏民族）发展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藏文化（吐蕃文化——藏文化）成为这里的主体文化，安多地区成为稳定的藏族聚居区，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安多文化系统生成了，由此安多藏区形成。该区成为吐蕃政权的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其范围囊括了东至陇右，西到青海湖以西，北括河西走廊，南抵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此时安多藏区的范围空前广阔。吐蕃政权崩溃，北宋立国，安多藏区主要为两个政权所统辖，一个是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唃厮啰”政权，一个是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六谷部”政权，安多藏区始终处在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的重压之下。此时该区域的范围逐步缩小，河西走廊在摆脱六谷部政权控制后，恢复了汉族政权统治，开始逐渐淡出安多藏区。元朝建立，安多藏区作为藏民族聚居区，被纳入元的中央版图。蒙古军队、部落、屯戍军和各个王侯官吏如同当年的吐蕃一样，大批进入安多，元朝在此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在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设置于蒙哥汗时期（约 1253 年），有宣慰使五员，下辖脱思麻（即安多）路军民万户府、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及元帅府、招讨司、军民安抚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管辖范围为今青海省东部和南部、甘肃省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包括今青海省的海南、黄南、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北部。因其主要辖地为脱思麻路，故又称脱思

麻宣慰司。而河西走廊已属永昌路划归甘肃行省，完全脱离了安多藏区。明朝在“承之旧制”的基础上，尝试由分治而趋统一的治理安多的政策，曾在安多“设府”“设县”，然不久即罢，于是转而实施军政合一的边卫机制，明廷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下辖乌斯藏、朵甘和河州三卫管理整个藏区。后来乌斯藏卫升为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藏。对元代的脱思麻宣慰司辖区，明朝因该地区藏、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故分别设置河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直接划归陕西行省管理。明朝还将元代的西宁州改为西宁卫，又在西宁卫以西设立安定卫、罕东卫、曲先卫等，由西宁卫遥领，隶属陕西行省，管理青海北部的各土司及藏族、蒙古族部落，其所辖空间范围即为安多区域。清时安多藏区全面郡县化，清朝沿用明朝的旧制，将西宁卫（后改为西宁府）、河州随地划归甘肃行省，将松潘、阿坝等地划归四川行省管辖。1700 年，清朝派四川提督率兵进驻打箭炉，重修铁索桥，并招抚木雅、喇滚、瞻对等土司，将雅砻江以东的地区划归四川行省管辖。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于 1912 年设青海办事长官。1913 年，设青海蒙番宣使。1915 年，改西宁镇总兵官为甘边宁海镇守使。1921 年，青海宁海军人据甘南拉卜楞地区。1926 年，改甘边宁海镇守使为护军使。 1927 年，宁海军撤离甘南，设拉卜楞设治局。至 1928 年将甘肃所辖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 年，青海建省，管辖原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及甘肃省的西宁府，省会设在西宁。其中拉卜楞寺地区及卓尼地区，因藏族首领与青海马家军阀的矛盾而划归甘肃省，成为今天的甘南藏族地区。安多藏区从此分属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无论其中边界辖区怎样变化，但三省所辖安多之范围大致未变。

可见，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安多藏区地域空间是不断变换的，其界限和内涵变化之频繁，变迁之剧烈也是该地域观念得不到本土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安多藏区的形成及其标志

第一节　　安多藏区的形成

安多并非自古就是藏区，而是随着藏民族的东向发展逐渐形成的。其形成过程经历了近三个世纪。

一、前藏时期的安多藏区

研究安多藏区远古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文献。考古成果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今安多藏区就是青藏高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藏地区与安多同属考古学上的青藏高原文化区[①]，二者在考古学上的部分遗址是共有的。如：距今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在西藏的聂拉木、那曲、林芝、昌都和安多的洮河、湟水流域等地均有发现，经考古学家发掘鉴定，这些遗址是同属“西戎集

①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载《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团”的[①]。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在西藏昌都出土的遗址文化特点相符，同时，两地的遗址与内地的“仰韶文化”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等主要方面有许多共性。从石器、陶器的制作工艺及房屋的建筑技术来看，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因此，马家窑文化又被业内称作“甘肃的仰韶文化”，是整个中原仰韶文化的一部分。考古证明，西藏和安多与我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安多在古文化遗址上与青藏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致性，说明安多很早以前就是西藏与中原的纽带。

文献研究同样证明了安多与西藏、安多与中原的密切联系。据《后汉书》记载：夏商周时期“舜流四凶”，古“三苗”中的一支，越过长江向西北迁徙，进入陕西的渭水流域在与沿途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演变为一个新的民族——羌族，[②] 春秋战国，随着秦国的强大，东扩疆土，西霸西戎，羌人之地首当其冲。为避秦扩张之锋芒，羌人被迫西迁，进入西边的湟中，后又入“河曲之地”。[③] 河曲、曲流，通常指河流一连串的迂回曲折河段，这里指“九曲黄河第一曲的 S 型大回转曲流处”。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后，流经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进入黄河第一曲的甘肃玛曲（因黄河首曲将县境围绕在内而得名）后，向东南绕玛曲的木西合、阿万仓、齐哈玛、采日玛四乡沿阿尼玛卿山由南向东蜿蜒迂回后折向北，流至曼尔玛乡受大山阻挡又折向西，经玛曲县的尼玛、欧拉、欧拉秀玛三乡后向北重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内，完成了黄河的第一个大回转。接着，黄河又向西进入青海海南藏族

①安金怀：《中国考古》，第 103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后汉书·西羌传》，卷八十七，本书二十四史一律采用中华书局校点本。

③刘夏蓓：《两汉前羌族迁徙论》，载《民族研究》，2002（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治州，依其西南向东北降低的地势，再次折向北后，向东经化隆、循化进入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形成了第二个大回转。这两个大回转构成一个 S 型，我们习惯上将该回转之地，即 S 型的流域地区，统称为“河曲之地”。河曲之地，古文献又称为“三河间”，主要包括今天青海省东南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当羌人大批“亡入三河间”① 后，这里成为羌人稳定的居住地，大约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间，羌人族种繁衍一百几十种，其中最著名的氐族部落有先零羌、卑南羌、烧当羌等,他们都曾先后在这里称雄一时,安多一时成为“羌区”。由于种种原因，羌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当秦再次西进相逼时，这些羌人中的一些部落，又一次踏上了西迁的路程，这次迁徙使羌族逐渐散布在青藏高原和今新疆南疆、北疆的广大地区，而留居湟中、河曲的羌人则为匈奴所控制”②。西汉初年，强大起来的匈奴，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羌人部落成了匈奴侵扰中原的基地。为了将羌人与匈奴隔绝，两汉政权对留在该地区的羌人再次实行了强制迁徙。大部分羌人被徙之陇右地区③，为了加强对羌人的管理，西汉政权设“护羌校尉”专门管理羌人事务。为防匈奴来犯，西汉政权还在陇右屯兵戍边。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大将赵充国的万人屯田，大规模的屯

① 《后汉书·西羌传》,卷八十七。

②刘夏蓓：《两汉前羌族迁徙论》，载《民族研究》，2002（2）。

③陇右，则泛指陇山以西地区。陇山，六盘山南段别称，古称拢坂。位于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至陕甘边界，南北走向，约 100 公里，海拔 2000 米左右，山势陡峭，是渭河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故称此山以西为陇右，大约相当于今甘、宁交界的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区。唐初曾将全国划为十道，其中陇右道，即辖陇山以西，青海湖以东，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地区。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又设陇右节度使，其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都），其辖境相当于甘肃省东南部及青海湖以东地区。

田使湟水流域成为安多最早得到开发的农业区之一。东汉继之而有所扩大，在河湟[①]、陇右地区屯田 34 部，进一步开发了这一地区。[②]

4 世纪初，辽东鲜卑族慕容部吐谷浑与其弟慕容廆因部落间争斗相伤，自率部 700 余户，由辽东西迁至阴山，又由阴山移牧枹罕（今甘肃临夏县），后来，其子孙与诸羌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统一了这里的氐羌诸部，于晋武帝咸和四年（329 年）以青海湖为中心建立起了统治政权，其都城在青海湖西 15 公里处的伏俟城。4 世纪末，鲜卑人秃发乌孤在青海东部又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南凉，国都乐都。这个政权先后从凉州（甘肃武威）掠夺万余人口，带回河湟，俟其灭亡，河湟的鲜卑人与羌人已日臻融合为一了。

5 世纪初，吐谷浑乘机占据了今青海海南、玉树、果洛等地，并率众大批进入，其统治范围“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③]。“甘松”今甘肃陇南地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白龙江流域以北地区；而“河南”，一般指河曲地区黄河以南，包括今天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东部等地区；“昂城”今四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白兰地”相当于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④] 也就是说吐谷浑的疆域是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从 5 世纪至 7 世纪，吐谷浑统治这一区域二百

① 河湟，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河湟地区包括湟水和黄河流域，河曲也在其中。而狭义的河湟仅指以河州、湟水为中心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青海海东和湟中地区。

② 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③ 《新唐书·吐谷浑传》，卷二一六。

④ 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4（1）。

余年[①]。

综上所述，安多在 8 世纪前，是一个以羌、吐谷浑为主要民族的聚居地。故而我们称其为“前藏时期”，而羌人是见诸史料和考古成果的青藏高原最早的居民之一，应为安多的土著居民。

二、吐蕃的崛起及对河西陇右的扩张

1. 吐蕃的崛起及其与吐谷浑、唐朝的关系

正值吐谷浑统治甘、川、青和新疆的一部分时， 6 世纪，吐蕃[②] 从青藏高原崛起，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不断东扩，入主河西、陇右、西域百余年，从而形成了安多藏族聚居区和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安多文化体系，这一过程经历了渗透、大规模进入和吐蕃化三个时期。

青藏高原，大约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分布着许多大小氏族和部落，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形成为数十个部落联盟。其中，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有一个自称为“蕃”（音勃）的六牦牛部落联盟逐渐强大起来。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在融合了羌等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为吐蕃民族集团。1 世纪至 2 世纪，吐蕃民族集团的聂赤被推举为“赞普”，“定君臣之分”，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吐蕃由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③]（2—6 世纪），即藏文史料记载的“七天座王”、“中二丁王”、“六地善王”、“八德统王”和“五赞王”时期[④]。从五赞王的最后一代拉拖徒日业赞到松赞干布之父郎日松赞，共经历了三

①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吐蕃一词，最早见之于《十六国春秋》，后新、旧《唐书》中亦有记载。对该名词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本论文采纳黄奋生先生的观点，即：符合藏民族习惯的民族自称。

③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51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④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52～53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个多世纪（257—581年），是中原魏晋南北朝至隋初时期。公元581年，郎日松赞赞普即位，在他统治期间，吐蕃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势力范围也明显扩大，西藏“诸小邦中的三分之二均置于它的统治之下”①。郎日松赞时，吐蕃国继续对外用兵，兼并强邻尼木、堆龙、逻些、达孜、彭波、墨竹工卡等部落，前藏各地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大部分地区成为郎日松赞赞普的属地②，吐蕃政权成为雄踞西南的强大政治力量。

但是，建立在部落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吐蕃政权，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赞普的统治并不稳固，各部落首领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正当郎日松赞致力于进一步统一高原各部时，由于内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动乱，赞普本人被毒杀；“父王六臣”、“母后三臣”先后叛乱。西部的羊同（即象雄）、北部的苏毗也乘机向蕃国进兵。西藏高原在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

大约在583年，郎日松赞之子松赞干布继承了赞普之位。他依靠中小贵族和部分忠于赞普的大臣的力量，迅速平息了叛乱，稳定了内部局势。

松赞干布，《唐书》中称其为弃宗弄赞，生于569年，③他13岁即位，性情雄武果敢而慷慨，喜欢骑马搏杀。在他继承王位的第三年（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从吐蕃旧都雅隆（拉萨南四日程）迁都于逻些（拉萨），在红山顶上（布达拉山）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迁都逻些成为松赞干布向外发展的起

①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第26页，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② 黄奋生：《藏族史略》，第5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③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本论文采纳黄奋生《藏族史略》中的观点。

点，“布达拉宫”成为其权力的象征。松赞干布在位初年，青藏高原和唐朝之间，分布着许多的部落和部族。由南而北，主要有：羊同、苏毗、西女国、东女国、多弥、附（读部）国、薄绿、嘉良夷、西山八国（弱水、悉董、清远、咄霸、哥邻、逋租、南水以及后来逃此的东女和白狗的一部的总称）、白兰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北利、摸徒、当迷、渠步、桑悟、千碉等部落及以青海河曲为中心的党项羌[①]。此时吐蕃社会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吐蕃还保存着原始公社制遗留下来的军事民主制特点，为社会战死的风气得到鼓励。据《唐书》载，这时吐蕃社会“贵少壮、贱老弱”,以战死为最光荣,连世战死的视为‘荣誉甲门”，懦弱败阵的，把狐尾垂在头上，作为耻辱的标记，为社会所唾弃。[②] “前队尽死，后队始进”使吐蕃在与其他部落的征战中，屡战屡胜，周围的部落相继被它征服。吐蕃于 631 年进攻河曲的党项，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的版图，奄有了现在西藏、西康的全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中间居有白兰、党项二部残户与吐谷浑接境，东以茂州、崛江西岸之西山八国与唐接境’[③].

7 世纪，由吐蕃崛起而引发的民族征战和由此造成的西北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也威胁到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曾经是唐朝恢复西域统治的障碍，后败于唐成为其附庸。此时夹在唐与吐蕃之间的吐谷浑地位十分微妙，面对吐蕃的强大与东进，唐朝册立诺易钵为河源王，并于贞观十年（636 年）许嫁弘化公主，采取扶持吐谷浑以抵制吐蕃的政策，目的是在吐蕃和唐朝之间建立一个

①南北朝末年，岷县境的宕昌羌，松潘境的邓至羌，包括在党项之内。
②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56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③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57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唐王朝在陇右地区设陇右节度使、河西地区设河西节度使，驻有重兵，以求将吐蕃遏制在青藏高原以内。而对于吐蕃来说，此时的吐谷浑已经成为横亘在其“东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吐蕃以吐谷浑离间其与唐关系，坏其“请婚”为由，发兵吐谷浑。吐谷浑大败，避于青海湖以北。吐蕃进攻唐松州（四川松潘），唐蕃首次交锋。在唐蕃的交战中，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强大，都想谋求和解的方式，经斡旋，“和亲”成为这一方式的首选。在唐、吐蕃、吐谷浑的交战中，“和亲”成为解决争端的手段之一，实质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尽管如此，和亲仍不失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它对三方和睦关系的维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在藏族民间仍广泛流传着有关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这些故事虽充满传奇色彩，但它的基本精神，则反映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反映了藏汉两族“和亲”事件的划时代意义，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敬重。 641 年(唐贞观十五年),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由长安经凤翔、秦州(天水)、河州(临夏)、鄯州(乐都),逾日月山（湟源西南）沿唐蕃古道进入今西藏。松赞干布率军至柏海(扎陵湖)迎接。松赞干布见李道宗行‘子婿之礼”,蕃唐从这时起建立了“甥舅关系”。至此，唐蕃之间赢得了一段“和平”时期。唐、蕃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了二百多年，据初步统计，自 634 年至 842 年的二百余年间，吐蕃使者共出使长安 100 次，唐使者出使吐蕃 52 次，平均 1 年零 4 个月唐、蕃之间就有使臣往来一次。正如《全唐文》所说：唐、蕃“金玉绩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①。此外，自 705 年至 821 年的 100 多年间，唐、蕃还举行“和盟”或“会盟”达 8 次之多。盟文中屡次重申唐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

①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全唐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